

潮汕文库

潮汕历史文献丛编

清·蓝鼎元 撰 郑焕隆 选编 校注

蓝鼎元
论潮文集



蓝鼎元论潮文集

清·蓝鼎元 撰
郑焕隆 选编校注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1993年7月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祝匡三 陈邢准

封面设计 王卫东 刘 静

221492/25

蓝鼎元论潮文集

清·蓝鼎元撰 郑焕隆选编校注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粤北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4 字数 330 千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

ISBN 7-80542-805-0/G · 208

定价:精装 26.80 元 平装 21.80 元

潮 汕 文 库

总顾问：吴南生

顾 问：庄世平 饶宗颐 翁锦通 陈传南 许世元

陈伟 刘思仁 沈野 林川 陈厚实

林维明 吴勤生 张华云 倪克屏

规划委员会

主任：刘峰

副主任：陈喜臣 黄福永 陈德鸿 杜经国

委员：王逸之 陈厉明 魏蒂

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杜经国

副主编：黄赞发 杨方笙 陈厉明 魏蒂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奎信 林伦伦 林淳钧 赵春晨 郭马风

黄挺 黄绮文 蔡仰頫 蔡起贤

主办单位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

永远荣誉会长：谢慧如 陈伟南

荣誉会长：陈大河 郑士彦

名誉会长：吴文宁 陈经纬 彭电武 詹伟山

名誉理事：许哲铭

(以上按捐款额及姓氏笔画排列)

会长：刘 峰

副会长：关勤生

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伟斌 马友光 王 七 方木宏 方壮彬

刘幸福 孙振明 麦友直 杜培铮 李福光

沈冰虹 陈 纤 陈作宏 陈武忠 罗 炼

郭以宁 黄绍生 曾桂清 谢秋城 詹友生

《潮汕文库》序

吴南生

我常常回忆着 30 年前，同样是“四厢花影怒于潮”的初春季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老舍、曹禺、阳翰笙先生等一行十几人，专程来访潮汕。潮汕的山山水水和那古老独特的文化艺术，深深打动了客人们的心。在这里，老舍先生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诗：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数十秋；
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这时，我奉命来汕头迎候他们。当老舍先生等将回归北京的时候，一再握别叮咛：要珍重潮汕的文化遗产，要好好发掘和整理呀！可是，时隔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的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向兴旺发达的大道。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重视的课题。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潮汕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繁荣发达。和全国一样，如何继承和发扬潮汕的优秀文化遗产，使之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也引起海内外各方面的重视。1990 年 11 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召开。1991 年 9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6 届国际潮团联谊会，又议定着手筹建“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与此同时，汕头大学成立了“潮汕

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也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两个专门机构，密切配合，组织协调有关的研究工作。最近，他们商定了学术研究规划，决定出版《潮汕文库》，准备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整理出版一批丛书，包括《潮汕历史文献丛编》、《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等10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出若干细目和专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远见的工作。

潮汕地区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文化特别是两宋以后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浩瀚的中华文化中一支富有特色的细流。自唐、宋开始，潮州的瓷器就远销海外。随着岁月的迁移，潮州与海外交往也愈来愈加密切。潮人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末清初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到世界各地。数逾千万的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断地把海外的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园。中外文化在潮汕融聚化合，经过历代潮汕人民的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海外潮人对传播和丰富中华文化是做出了贡献的。认真研究潮汕的历史和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推动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大家议定，研究潮汕历史文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使研究工作取得踏实、丰硕的成果，首先应该做好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和出版工作。现在准备出版的《潮汕文库》，就是按这一要求迈出的第一步。

潮汕的历史文物、文献完整保存下来虽然不多，不免会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从总体上看，数量还是不少的，这些已经流传下来的文物、文献，有待我们去整理研究。埋藏

在地下的还可能陆续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们的口碑也相当丰富；散布在民间和海外的文物、资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数量，只要各方重视，抓紧发掘、采集，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

有一个很能说明上述观点的事例：1956年初，梅兰芳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率领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日本友人赠送给两份明代戏曲刻本的摄影本，不知是哪一种剧种了。当梅先生等全团经香港回到广州时，刚好潮剧团正在这里演出《荔镜记》。梅先生等观看演出后，一查对才知道两份刻本都是潮剧的古本。这两份刻本，一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附刻《颜臣》），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后又发现，同一刊本的又一印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二是万历刻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此件无刊刻年份，可能是万历初年刊本，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这之后又8年，即1964年，再发现有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潮剧刻本，卷一首题“潮州东月李氏编集”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现藏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是：1958年在揭阳县明代墓葬中出土发现的嘉靖年间戏曲手抄本《蔡伯喈》（即《琵琶记》），戏文中夹杂潮州方言，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1975年12月又在潮安县的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年间手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文中先后写明书写时间是“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和“宣德七年六月”即（公元1431年、1432年）。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这些都是稀世之宝。上面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潮汕文化有丰富的遗产，也说明了还有一定数量的宝贵文物、文献，或者埋藏在地下，或者散藏在海内外，有待我们去发现。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正在等待我们和后人去做。

显然，《潮汕文库》的出版，对于唤起海内外人士重视发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献的热情，对于系统地积累潮汕历史文化资

料，顺利地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我想，这也是编辑、出版《潮汕文库》的目的。

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要我为《潮汕文库》写篇序言。我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小学生，说不出什么。但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老舍先生和历代众多的名贤学者们的期望，今天终于能够开始实现，从心底感到高兴，因而乐于借这个机会，祝愿《潮汕文库》早日问世，祝愿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工作顺利进展，尽快取得丰硕的成果。

1992年2月15日于广州

序

蔡起贤

潮州封建社会时代的府县长官，具经济才而又能文章的，屈指可数。蓝鼎元可算是特出者。他亲自制作有关潮州政治文化的著作独多。他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福建漳浦县菴溪人。雍正三年以贡士于内庭参加分修《大清一统志》。后由相国朱轼举荐引见，向皇帝条奏经理台湾六事，得到皇帝嘉纳，授广东普宁县知县，七月到任，才二月，十月十八日又命他兼任潮阳县知县，莅任视事，虽案牍劳形，全不顾惜。他在《复顾太史书》中说：“秉笔连宵，鸡六鸣而后就寝，则终夜不寐也。如是者十四越月。”旧例新知县到任，所属渔船，即着令换照，此项收入，银一千八九百两；又保正乡约，须另给照，此一项收入，也一千六七百两，蓝鼎元都把它废除，得到县民的称颂。这十四个时间，他的最大政绩，在折狱与兴学二事，如《五营兵食》的抑制豪强；《三究盗尸》的惩讼棍，办反坐；《邪教惑民》的亲擒妖妇破除迷信；《兄弟讼田》的修人伦……等案件，蓝鼎元都经过详密调查，据实断案，犯人服罪，县民颂德。他后来被诬入狱后，还在狱中把这些案例，纪录成书，命名《鹿洲公案》。旷敏本为他作序称：“谳折疑狱，钩致出奇，骎骎有包孝肃遗意焉。”传包拯有《包龙图公案》，但案多鬼事，且有些事不是包拯所有，绝不能与蓝氏《公案》的全无虚假造作相比。因案中人俱在，如《蜃楼可畏》案中的有关人物陈能夏，后来还帮助他编修《潮州府志》。后人更转录《公案》中案例，

如《清稗类抄》一类的书，即抄录《兄弟讼田》一例，可见此书的被人重视。蓝鼎元治潮阳，更重视兴学育才，著《棉阳学准》五卷，建书院，置学田。所立规章制度、教学内容，以及生员姓名都收入《学准》中。从《学准》中，可以看到蓝氏的教育思想，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在重兴闽学，即朱子之学。潮州南宋时的官师多为福建人：如曾汪、曾噩、林霆、孙叔谨、郑良臣、廖德明、陈宏规、陈圭父子。廖德明是朱熹门人，陈圭还捐金买朱子的书充实“城南书庄”。南宋时闽学对潮州确有很大的影响。蓝鼎元兴学的目的，也正如旷敏本所说：“读《棉阳学准》，幸濂洛真传犹在今日，知鹿洲自任斯道者重。”我们知道，明王朝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宗，作为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以其学说著作，作为科举经义考试的标准，用它来禁锢人们的思想。到正德年间，王朝统治已出现严重危机，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旧的程、朱思想，对知识分子已失去其控制能力，于是出现了王阳明一派的“良知”之学。潮州人如薛侃一家和他的友好林大钦、翁万达等最勇于接受这一新学说，无疑地这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挑战）。但王学末流，也不能挽回“人欲横流”的狂澜。所以蓝鼎元乘机奋起肩起振兴朱学的重任。力排薛侃兄弟子侄及杨骥、杨鸾等人的学说；即影响于陈白沙、王阳明学派的禅宗南支在潮州的代表人物大颠，当然也被批判。所以我们读《学准》，有必要弄清产生此书的时代背景，与蓝氏学术思想的承受渊源。

封建王朝的清官也不易当。像蓝鼎元这个“莅官以来，未尝制一衣一丝自奉；妻妾竹钗布裙，未尝以一分金银为簪珥”（《再复蔡宗伯书》）的廉吏，也不免被诬革职。原因是连年饥荒，制、抚们申请朝廷，准许拨省仓西谷，贮藏各县仓库备赈。惠潮观察使楼俨买西谷一万四千石积藏潮阳仓中。楼俨竟串同运官船户沿途盗卖，杂取扁谷糠秕与水搀和。蓝鼎元因置船户于狱，运官报说这是奉观察之命，请求释放船户，被蓝鼎元抗

绝，因此得罪上官。同时当他在翻成案，雪冤诬时，由于性情伉直，往往违忤上官旨意，忌之者也乘机构陷，罗织罪名，以革除船户例金，并栽赃千余两等六款上奏，遂于雍正六年底奉旨革职入狱。幸赖潮、普士庶凑集银两，帮他赔偿所谓赃款，到雍正八年夏秋之间，冤案才初步得到澄清。而潮州知府胡恂即邀请他到潮州负责编纂《潮州府志》。他在《鹿洲初集·潮阳陈烈女传》中说：“庚戌秋，有预修郡志之役。”蓝鼎元富有修志经验，是这项工作的当行里手。他十七岁时，便对海疆地理有很大的兴趣，“观海厦门，泛海舟泝全闽岛屿；历浙洋舟山；乘风而南，沿南澳、海门以归，自谓此行所得者多。”（《行述》）可见自少年时他对海疆形势便了然于胸次。雍正三年到内庭分修《大清一统志》，对全国形势更有全面的了解。且从其中获得不少知识。故当时出任边疆的大员，临行时多要访问蓝鼎元，要求他条陈该地方的情状利弊。他这次参加修《一统志》可说是为他造就修志的才能。清朝顺治以后，各省、县因应功令，编修地方志备《一统志》参考之用，故潮州顺、康、雍、乾叠有修志之事。现在聘请曾参加修《一统志》的人负责修地方志，正似驾轻车就熟道，易收事半功倍之效。又蓝鼎元是漳浦县人，过去有所谓“漳潮一家”。又有“下四漳”之称：即指诏安、云霄、东山、漳浦……等县。他们的语言风俗和潮州相同。蓝氏对潮州自然也觉得很亲切。主持修志，志书内容及持论也就更切合实际。他修成的雍正《潮州府志》成书二十四卷，列目三十，后人评论说它“较吴（吴颖顺治《潮州府志》）林（林杭学康熙《潮州府志》）两志，参订更详”。

蓝鼎元的修志观点，现在看来仍不失其意义。在《修志杂说》中就明确提出：“窃谓方隅纪载，皆关政治。随事提撕，当与遵铎不殊。非徒沿袭旧文，登记簿牍。”又说：“且岁月沧桑，诸事非昔，难胶旧辙。”故而志中的十余篇各县《图说》，既保存康、雍时代各县的地名村名，对于山川险要尤其言之凿凿，他

的着眼点都在于边防设置。如提倡揭阳西部宜设一县。其他各县的险要处所，应该设驿或置哨，与他在《平台纪略》中论半线一路须分立彰化县；《论镇守南澳事宜书》具体提出应如何加强防务，都是他一贯从实际出发的主张，尽是当时的要著。至于各分志的《小序》和《总论》既是分志内容的提要，也说明资料取舍的理由，设例的目的，都有自己的见解。惟《风俗考》一篇，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歪风陋习，可说暴露无遗，而又重视破除迷信，这是十分必要的。但说由于“自昌黎公贬谪无聊，与大颠一接”之后，引起人们对大颠的崇拜，扇起了迷信风，大颠当然是罪人，连舌镜塔也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是他卫道的虔诚，不过难免以偏概全或言过其实。正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的《复顾太史书》一样“尤为所养不宏，”有伤轻薄。但也瑕不掩瑜，各县《图说》常被后修志者所称引，有的也被收进《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广东海防汇览》一类书中。他撰作的人物传也可补前志的不备。再如《潮州海防图说》：“港澳虽多，沙礁暗阻，风涛不测，商艘来往，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有“汕头”载籍都写作“沙汕头”，简称为“汕头”；自蓝氏此篇《图说》开始，一直沿用到今。若《海阳图说》：“城南六十里为庵埠，迩海濱，烟火万家，商贾百货之所集也。”庵埠昔日的繁华也有赖于蓝氏的记录，由此更可证庵埠早设海关的理由。

郑焕隆同志把蓝鼎元这位县令的政绩和学术两方面有关潮州一州的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从《鹿洲初集》二百四十篇中，提取关于潮州的著述九十篇，改变以文体分卷体例，为依内容分类，便自成条贯，易于阅览；《鹿洲公案》全为潮、普二县事，各自独立成篇，为保存全貌，不宜删削，二卷二十四篇，全部收入；《棉阳学准》五卷中，两卷为一般理学语录，一卷为理学论文，与潮州政治文化少有关系，概从删除，仅选录前面两卷，使适合《论潮》体例。这本文集，是潮州地方文献难得的一种。

有关潮州的地名人名物掌故等，由于历史变迁，时代久远，不易为现在的读者所了解。故在注释方面，郑同志下了不少工夫。特别是已散佚的雍正《潮州府志》中的各篇《图说》，是蓝氏的精心制作。注释尤详，使古今对照，该地该村所在方位，一目了然。对其他注释则力避繁琐，但为了使读者减少阅读时的障碍，如“放则弥六”、“技彦不啻自口出”等较僻奥的词语典故，也给予合理的引据疏通。郑同志为编注这本书，参考了不少有关著作，仅有关监鼎元而分散在其他各书中的传记资料，就搜集了成十篇，并以蓝氏自己的记述，订正了蓝氏的儿子蓝云锦所作《行述》中“雍正六年秋，奉派出宰普宁县”的六年为五年之误。这一字关系重大，倘作六年，便出现蓝氏的文章有很多时间前后的矛盾，改正这一字，还他蓝氏著作的本来面目，可见郑同志所花的功夫委实不少。

郑焕隆同志《蓝鼎元论潮文集》的成稿，我得先读，对他的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十分佩服。蓝鼎元的志存世道人心，心系生民国家，严辨风俗之贞淫，欲使浇薄反于淳厚，奠封疆于盘石，严海洋之边防等所想所为，藉这本书的刊行而声名益彰。而郑同志的工作，不仅对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也可说是蓝鼎元的异代知音。

前　　言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号鹿洲，福建漳浦人。父早逝，家贫，靠母亲教育和从师苦学，打下了很好的学问基础。从小有志于用世，留心“经济”。受知于福建督学沈涵，又得名儒福建巡抚张伯行器重，参与“纂订先儒诸书”。不久以祖父母及母亲需侍养而自请回乡，继续攻读并教学。多次应乡试，却没考中，生活清困，但已渐著声名。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率众反清，当时的南澳总兵蓝廷珍是奉派前往平定的将领之一，廷珍知族弟鼎元学识才干，邀其随军作幕，他在军中多方运筹赞画，充分表现了从事军政实务的才能。雍正元年，以文行兼优被选为拔贡生，入京，“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被推服“有良史才”。约雍正五年（1727）初，大学士朱轼推荐，雍正皇帝召见，甚加称许，授予广东普宁知县。七月到任，全力投入政务，着力整顿治安，两月而大见成效。十月兼署潮阳知县，短时间内，也政绩显著。由于秉公执法，不同流合污，得罪惠潮观察等上司，被诬贪赃，于雍正六年底被革职并入狱。雍正八年夏秋间，案事初步澄清，适值当时欲新修潮州府志，知府胡恂聘其任纂事，乃出狱。雍正十年初，案结，原拟回籍，以广东总督鄂弥达恳邀，赴督府。其后经鄂保荐，特旨赴京，雍正帝再次召见，授予广州知府。十一年夏到任，履任才一月病逝，年五十四岁。

蓝鼎元官阶不高，任职时间短，但身后名气却相当大，曾被目为清代数百名人之一。除闽粤二省有关的志书为其立传，还

有后来《清史稿》及其他多部有影响的传记总集都有他的传记〔详见本书附录（二）〕，直至近年的出版物如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一书也收入了他。他的名字还被收进包括新本《辞源》的多种辞典。他的著作《鹿洲全集》八种，基本上都被《清史稿·艺文》著录。其中《鹿洲初集》、《东征集》、《平台纪略》且被收进《四库全书》。此外，《龙威秘书》、《昭代丛书》、《荆驼逸史》、《申报馆丛书》、《治台必告录》收入《东征集》或《平台纪略》。至于单篇著作，则广泛被收入《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有关的多种地方志。于此可见其著作影响之广，其名气之大。

蓝名气大，首先是由于他的思想观点符合旧时代的政治标准。他奉行和阐扬传统的儒家学说，忠君孝亲，承认清王朝为正统，一生读书治学，讲求养性修身，阐发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些都使他被认为是“正人”而受到尊崇。

其次是他的“经济才”受到重视。蓝有学问，能文章，但并不止于是位文士和道学先生，而是具有“经世治国”的实际才干。他的《东征集》和《平台纪略》及其他若干篇有关台湾的文章，过去被认为对治台有真知卓识，因而被奉为治台专家。他任普、潮县令，只一年多，治绩卓著。他的多篇著作被收入《国朝经世文编》，表明对治道有实用性。他的声誉还由于为政清廉，关于这点下面再具体谈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学者的身份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蓝有学问，是清代福建古文家之一，被收入后来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他对理学也有相当造诣。以上这些使他成为一位全国性的历史名人，而不仅只是一个地方性人物。从潮州范围说，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知县以至知府一级官员，其名气和著作可以比得上他的。因而他的著作有关潮州的部分，就是十分珍贵的潮州地方历史文献。而且，还值得指出的是，历代潮人著述虽然为数不少，但其内容很多却是无关于潮州的；而蓝作为一个非潮人，著述中却有不少有关潮州

的内容，这就更为难得，这也就是选编本《文集》的根本依据。

本集选收蓝鼎元有关潮州的各类著述，其意义和学术水准如何，从撰者的身份以及后人的推许，大体已可了解，这方面，读者也可自行评价。但必须指出，蓝毕竟是个封建官员、正统的儒家学者，这就决定了他的著述的基调是维护封建统治，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因而在不少地方，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因素，也就是所谓的糟粕。这是历史的局限，今天的读者是能够理解和分辨的，因此本文对此不多予评论，现在着重要探讨的是，这些内容，今天作为潮汕地方文献，它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下面谈谈笔者个人的见解。

一、所收入的各篇、卷，都与潮有关，所以它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了当时潮州府，尤其是普宁、潮阳二县的各种状况，举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以及吏治等，都可从中见到一些踪影。比如当时普、潮二县多盗多讼，《公案》就提供了许多事例。而多盗的原因，除了前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还由于社会上贫富悬殊：“世家大族，乡绅举贡”拥有“连阡广陌”的土地，而“乡间居民，有粮者少”（《公案·五营兵食》）。一些生活难度的穷人，有的就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公案·闽广洋盗》载：林老货“因家贫乏米……往麒麟墟买米，遇洪伯丰……商谋出海行劫米船”。他出为海盗后，妻子却仍在乡中“日出丐食”。《公案·邪教惑民》等篇，反映了潮阳及毗邻诸县迷信的盛行，对照今天潮汕一些地方迷信的重新风行，可以了解其发生的历史根源；而从蓝处治迷信的方法，也可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初集·潮州风俗考》全面论叙当时潮州府的社会风俗，其中有“商竞刀锥，航海者众。福建台湾宁波上海交广海南，视若户庭”之句，从这可了解到当时潮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活跃和足迹所至之广。《初集》中有若干篇提到蓝被诬罢官后，潮、普士庶对他的热情支助：凑集银钱，帮他“退赔”；他在潮一家生活有困难，赠以薪蔬米肉。这既反映了蓝在任得人心，又